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转型中国研究丛书

郭苏建◎主编

转型中国的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 和方法问题研究

郭苏建 等◎著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转型中国研究”丛书

郭苏建主编

转型中国的社会科学理论、 范式和方法问题研究

郭苏建等 著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转型中国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郭苏建

副 主 编：刘建军 孙国东

编辑委员会：顾 肃 刘清平 林 曦

丛书序言

“转型中国研究”系列丛书是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复旦高研院”)和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年度主题研究成果的丛书。该丛书以“前沿性、基础性、学术性、国际性”为理念,力争经过数年的努力,建设成为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具有较高水平的综合性、跨学科学术丛书。

2013年以来,复旦高研院进入到转型发展的新阶段。复旦高研院借鉴国外大学高研院的一般做法,通过一系列新型学术建制吸纳和整合校内外优秀研究人员开展对基础理论和重大实践问题的跨学科研究,力争生产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年度主题”(annual theme)是借鉴国际上大学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的有益经验而于2013年设立的新型学术组织机制。所谓“年度主题”,即研究机构根据自己的总体研究规划所设立的每年度研究主题。建立“年度主题”制度,引导本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及驻院研究人员围绕某个主题分工协作、集体攻关,是国外科研机构特别是高等研究机构的通行举措。比如,现代高等研究机构的先行者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就在其二级研究院普遍采取了研究主题制度。如何结合现代中国转型中的重大理论课题展开专题性的深入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提升自己研究水平的基础性工作。复旦高研院“年度主题”建制,正是为了推进上述历史使命而设立的基础性学术组织机制。

为了使“年度主题”制度符合高研院的发展定位和预期目标,我们还建立了与之相配套的科研项目管理体制,即常规性的“研究项目”(research programs)——“价值建构研究项目”和“制度建设研究项目”。价值与制度是有机统一体,价值是制度建设的基础,对制度建设起着导向与主导的作用。价值和

制度在实践中表现为价值建构和制度建设两个重要方面,涉及我国政治、法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制度建设和价值建构范畴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涉及群体与个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人与人、人与自然等诸类主要关系范畴;涉及不同文明和发展模式的多元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人类共同价值追求与中国主体价值的关系,以及中国未来发展目标和理想图景。因此,对价值和制度为核心的一般性问题和一系列关系中国转型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理论探索、理论建构和理论创新具有特别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指导意义。

在具体运行中,我们以研究项目为组织形式,并通过“驻院研究员”“访问学者”等机制吸纳校内其他文科院系、校外乃至国外相关研究力量,组织专职研究人员和驻院研究人员围绕“年度主题”协同攻关。我们还专门设立了“年度主题席明纳”,每月由一位研究者做专题报告,“年度主题”研究参与者全体参与讨论,以期每一项研究都经过全体参与者的充分讨论。

为反映我院“年度主题”的研究成果,我们与格致出版社组织出版了“转型中国研究”丛书。目前,该丛书已经出版了《转型中国的正义研究》《转型中国的法治研究》《转型中国的治理研究》《转型中国社会秩序建构的关键词辨析》《转型中国的村治实践研究》《转型中国的基层选举民主发展研究》《转型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新探》等研究论著。

2018年度的“年度主题”是“转型中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和方法问题研究”。该主题旨在研究和探讨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范式和方法所涉及的新领域、新概念、新路径,既对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和研究现状与未来、农村政治学、政治文化、新政治人类学、公共管理、比较政党政治、城市空间政治学、比较选举研究等领域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进行了研究,也对规范性研究、价值建构、价值中立、阐释学、现象学、实验方法、概念和类型学方法、社会调查等研究方法或分析路径进行了新的探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转型中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和方法问题研究》就是该年度主题项目的集体研究成果。

本研究项目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郭苏建博士领导、策划和主持,并由其担任丛书主编。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刘建军和复旦大学社会

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孙国东教授担任副主编。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顾肃教授、刘清平教授、林曦副教授为该系列丛书的编委会成员。

郭苏建

目 录

丛书序言	郭苏建	1
------------	-----	---

理论和范式篇

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现状评析		
——中国政治学科向何处去?	郭苏建	3
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四十年		
——历程、挑战与前景	王中原 郭苏建	12
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建构与经验进路	顾 肃	34
社会科学的价值中立何以可能?		
——兼析韦伯的事实与价值悖论	刘清平	65
阐释学与法哲学的公共阐释		
——公共法哲学的认识论基础	孙国东	102
政治现象学的理论	林 曦	124
空间转向背景下的空间政治学	宋道雷	148
超越公民文化:政治文化研究的要义和贡献	胡 鹏	172

研究方法篇

困境与挑战:农村政治学的理论方法演化与范式转换	贺东航 李 壮	191
行为科学与公共政策:对政策有效性的追求	朱德米 李兵华	208
中西政党政治的实践、研究范式和方法:一个理论反思	张春满	220
选举预测的科学方法 ——兼论政治学预测性研究的学科定位和发展前景	王中原 唐世平	242
两种扎根理论的方法论辨析	陶 庆 牛潇蒙	267
探求因果关系:实验在政治学中的应用	顾燕峰	288
认知心理学视角下社会调查中的应答问题与解决方法	左 才	317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倾向分值匹配方法	郑冰岛 朱汉斌	337

转型中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和方法问题研究

理论和范式篇

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现状评析

——中国政治学科向何处去？*

郭苏建**

一、问题的提出

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政治学科发展目前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最近几年来关于当前中国政治研究怎么发展的学术争论,从一定意义上说,类似于美国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行为主义革命”时期的大论战,怎么评估学科发展的现状、问题、挑战、发展方向,是继续科学化还是本土化,是强调普遍性还是特殊性,抑或是两者的协调统一,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对学科发展方向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国际一流政治学家,诸如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西德尼·维巴(Sydney Verba)、戴维·阿普特(David Apter)、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阿伦·利普哈特(Arendt Lijphart)、戴维·科利尔(David Collier)、詹姆斯·马洪(James Mahon)、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tori)、加里·金(Gary King)、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国际关系领域的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约瑟夫·奈(Joseph Nye)、罗伯特·查维斯(Robert Jervis)、斯蒂芬·克莱斯勒(Stephen Krasner)、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等国际一流国际关系理论家的著

*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8 年第 5 期,《新华文摘》2018 年第 16 期全文转载。

** 郭苏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作和文章仍然被当作教科书使用和阅读,并深刻影响着我们对中国政治及其外交政策行为的研究。另一方面,有些中国学者开始不断质疑西方的范式、理论、概念和方法在中国研究中的适用性,并试图在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的学科领域内发展出一个“中国学派”。他们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民族特性、知识传统、地方性知识和国情。正是在这种语境下,我认为中国的政治学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并且是检验和评估中国政治学现状的时候了——该学科领域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包括成就、挑战和趋势。^①

四十年来,我们见证了中国研究特别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源于中国的各种变化及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同时也得益于我们学术研究方法的诸多改进。作为区域研究,中国政治研究已不再“孤立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科,而是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在《中国政治学刊》(*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和其他政治科学期刊中的简单调查,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政治研究学者已将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他们的研究,并且达到了政治学、国际关系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相应的学术规范和理论水准。今日的中国政治研究已远不同于昔日的传统汉学研究(*Sinology*)。这不仅体现在理论和方法的多样性上,还表现在我们在一个更加宏大的比较视野下关注中国的诸多议题。

二、争论的主要议题

近几年来,国内外政治学者围绕中国政治科学如何发展及向何处发展这个充满争议性的重要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比较集中的争论是关于西方政治科学和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关系的讨论、西方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的政治科学逻辑和方法论问题,涉及诸如普适性与特殊性、规律性与差异性、科学性和本

^① Sujian Guo (ed.), *Political Science and Chinese Political Studies: The State of the Field*, New York: Springer, 2012(中文版为郭苏建主编:《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学科发展现状评析》,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本书是西方学界第一本系统介绍这个论战及其涉及的一系列重大又具争议性的问题,由国际和国内政治学界的优秀学者参与写作。本书中文版的出版旨在扩大这些学术成果对于中国政治研究的影响,推动这个领域的学术反思和对话,并给中国政治学科的师生和研究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材料。

土性以及在中国崛起背景下中国政治研究的主要问题、挑战、机遇、趋势和方向。虽然争论仍在继续,但是必将深刻地影响这个领域的学术发展。我希冀本领域内的所有学术同仁都能继续致力于推动中国政治研究的发展。

第一个议题涉及学科领域的现状的认识和评估,对这个议题,争议较小,一般认为,无论在内容、主题、理论、方法,还是在深度和广度上,中国政治研究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恩·怀特认为这主要得益于海内外中国学者多年来的努力和贡献,其次得益于改革开放之后,地方数据不断公开。同时他还认为,对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政治研究要求方法和理论上的创新,从而丰富政治学各学科领域的内容和范围。^①但也有学者认为,虽然中国政治学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并产生出一些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学派和研究路径,但在理论和方法上还有不足,深度和广度还有待进一步扩展。^②限于篇幅,本文就此不赘叙,主要想更多地介绍另外两个重大议题的争论,进而发表我个人的粗浅看法。

第二个议题涉及中国政治研究的认识论。它更关注政治知识的本质,以及知识如何获取、能达到什么程度,而不是关心知识的内容、方法和研究设计等具体形式。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如何理解政治知识的本质和政治转化为知识的途径。争论的一方强调科学性、普遍性和实证主义传统,另一方则注重特殊性、历史性和传统内涵。前一类学者质疑中国政治研究的“本土化”,认为中国政治研究应该与比较政治学和社会科学具有相同的逻辑,因为政治科学致力于探索和解释存在于政治生活、现象和行为中的一般规律。通过吸收西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科学方法和理论,中国政治研究在增进政治知识上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他们认为“中国政治科学本土化”这一命题轻则误导学人,重则严重影响整个政治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作为社会科学家,不应该满足于使用“中国本土性”或者“中国特殊的文化因素”来解释中国的政治行

^① [美]林恩·怀特:《中国政治研究:该学科发展现状综述》,载郭苏建主编:《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学科发展现状评析》,第二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② 参见[美]彼得·穆迪:《政治文化和中国政治研究》,杨光斌、李淼:《西方政治学理论与中国政治理论的发展》,景跃进、王国勤:《西方政治学研究取向和中国政治学方法论的发展》,载上书第三、四、五章。

为和现象。相反,应该争取中国政治研究更加科学化,以及去“中国特色化”,认为中国政治科学发展在于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以“时空变数”来取代“中国”或“中国的”这些名称,进行跨文化对话,从而才能把这些国别或个案的“条件”和“文化因素”概念化,并上升到一般理论高度,对世界政治学发展做出贡献。^①主要代表人物有钟杨、杰弗里·C.艾萨克(Jeffrey C. Isaac)、阿尔佩曼(Björn Alpermann)、何包钢、吴国光等。但另一批学者则强调科学方法的局限性,质疑“唯科学主义”或者纯粹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指出很多重要的内容和信息被简化了,中间还丢失了大量的内容和信息,使得政治研究缺乏解释力,并使得政治分析缺乏历史的、社会的和哲学的视角,而政治等社会问题的研究恰恰需要这些视角来观察和分析,才有深层次的理解和实践应用意义,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需要,维护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他们积极倡导中国政治研究在方法论上的自主性、特殊性和多样性,反对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嫁接到中国的“拿来主义”。他们试图在研究中融入中国独特的政治和社会关怀,强调其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和发展路径的特殊性,而不是遵循一个统一发展路径,不能追求纯粹的实证主义方法,造成方法论上的“全能主义”、狭隘或缺乏社会相关性和政策相关性。他们强调,随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重构和迅速发展,必将影响海内外的学术发展。^②主要代表人物有王绍光、乔恩·R.泰勒(Jon R. Taylor)、任雪莉(Shelley Rigger)等。

第三个重大议题涉及中国政治研究的问题、挑战和趋势,重点关注科学知识和地方性知识之间本体论的争论,即科学化、西方化与本土化的关系,也即关注对现实存在的研究,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本质、身份定义和意义,“中国”和“他者”之间的范畴区别,及其对中国研究的影响。中国政治的研究经历了不

^① 参见钟杨:《从比较政治的逻辑看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德]阿尔佩曼:《关于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充分利用多样性》,[美]杰弗里·C.艾萨克:《对科学探索、学术自由和启蒙之关系的反思》,何包钢:《中国崛起语境下我国政治学发展的困境》,吴国光:《当代中国国内政治研究反思》,载郭苏建主编:《政治科学与中国政治研究—学科领域现状分析》,第七、八、十一、十二、十三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② [美]乔恩·泰勒:《中国政治学的抉择:方法论实证主义还是方法论多元主义》,[美]任雪莉(Shelley Rigger):《美国政治学科重建运动及对中国政治研究的启发》,王绍光:《“接轨”还是“拿来”——政治学本土化的思考》,[美]乔恩·泰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载上书,第九、十、十四、十五章。

同的发展阶段,从一开始从西方引入政治科学的基本概念,到政治学科的建立的转型。一部分学者强调科学研究的前提条件,即学术自由、自主性、独立性等,讨论中国政治研究为何缺乏科学性,什么因素阻碍了中国政治研究成为规范意义上政治科学的一部分。其还认为在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中,政府导向的研究占据主导地位,政治学研究服务于经济发展和政治需要,使得学者依赖于政府并失去了独立研究的能力,学者更愿意为政府提供咨询服务而非进行独立的学术研究。^①另一部分作者则检讨了西方范式、概念和方法在研究中国政治上的不适用性,因为西方理论忽略了中国本土的差异、地方性知识和经验。他们试图回答这样一些问题:中国政治学是否有必要本土化?是否有可能?如何本土化?然而,他们认为本土化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而是意味着持续不断的努力。如果没有本土学人的自觉和积极的努力,及自我反省,本土化是不可能的。他们积极倡导在中国的语境下建立本土化的中国政治学或中国学派,认为迅速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科学”将对海内外的学术共同体产生重大影响。^②

三、中国政治学科向何处去?

关于这场争论,我的观点是出于对当今世界的两大基本认识。

其一,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处在农耕时代,而是处在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时代,这个全球性的快速发展过程不仅带来了科技和产业革命、物质世界的变革,而且对人类的精神世界、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巨大的影响,我们需要培养适应时代需要并具有全球视野、多元开放思维方式的国际化创新人才,政治科学发展必须以此为出发点和导向,从人才培养到学术研究,都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才能有进一步深化和新的的发展。但这并不排斥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要考虑国情和特殊性。中国只有把某些传统价值观与“现代性”的问题及

^① 参见[美]杰弗里·C.艾萨克:《对科学探索、学术自由和启蒙之关系的反思》,何包钢:《中国崛起语境下我国政治学发展的困境》,吴国光:《当代中国国内政治研究反思》,载郭苏建主编:《政治科学与中国政治研究—学科领域现状分析》,第十一、十二、十三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② 王绍光:《“接轨”还是“拿来”——政治学本土化的思考》,[美]乔恩·泰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载上书,第十四、十五章。

我们所处的时代接轨,才能创造性地提出能够指导社会实践运动和社会变革的新的价值观和理论,才会对世界文明和知识生产做出重大贡献。

其二,在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我们生活的世界是“西方不亮东方亮”吗?是利益博弈上“零游戏”吗?是你死我活的相互竞争、根本对抗性的世界吗?我认为,在这个充满多样性的多中心的“新世界秩序”和充满个性化、创造性、多元性的差异多元共存的时代,占主导性的发展趋势是“兼容、融合、趋同”,即各种价值观、模式、区域在竞争中相互学习,相互兼容,而不是消灭对方,或采取同质化、统一化的思维方式来认识变化中的世界和新时代。其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化和信息化已打破分工和国界,使得全球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使得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都已成为不是单一国家的问题,能源、资源、科学发展、技术转移、资本流动、人口、气候、环境、风险社会的代价、传统和非传统安全等都关系到自身和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已不是单一国家可以解决的,必须进行超越国界的参与才能解决。全球问题需要全球参与、全球治理,任何一个国家和国民都不能置之度外。^①

基于对我们所处时代的上述两大基本看法,我试图从几个大的视角来思考和回答这个重大问题:中国政治学科向何处去?

首先,对“新世界秩序”和新时代的特征和性质的上述认识决定了我们必须创造性地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其“现代化”,不是“西方化”,而是使其具有“全球的”“世界性的”的普遍价值和意义。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在方法论上摆脱“民族主义”的视野,正如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提出的,采取“cosmopolitan methodology”^②,即“世界主义的”方法论、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世界观、有国际交流性的学术研究,我们的学术研究才有可能有效地参与全球化过程中不断变化的新世界秩序的重构,并与世界进行实质性的对话,进而影响世界进程和世界秩序的重构。

任何伟大文明都有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体系基础。但是,强调“自主性”和“主体性”并不能成为排斥其他文明成果(包括西方文明)的借口。中国政治学

^① 郭苏建:《新世界秩序与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载《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1期,第5—8页。

^② Ulrich Beck, *The Cosmopolitan Vision*, Ciaran Cronin(trans), Cambridge: Polity, 2006.

科发展必须走向世界,必须向其他文明学习,就像企业创新一样,必须学习,在学习中不断自我批评和反省才能创新,必须对我们自己已有的传统和知识进行自我批判和反思才能创新,从而形成和发展出新的学派、理论和方法。知识生产是不能分“东方的”“西方的”,要搞“五湖四海”,要“中西古今”兼容,这是 21 世纪“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需要,也就是我们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否则,我们怎么进行国际交流和对话,难道就是对世界说说自己的故事吗?只有适应中国的需要,不断吸取其他文明有价值、有用的优秀成果,并建立和不断更新自己的社会科学研究规范体系,才能在与世界交流中发展自己,特别是要能够回答和解决中国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和具有全球性的重大问题,并把我们的研究上升到一般性理论高度,并介绍给世界。如果我们做不到,就谈不上去影响世界。

其次,我们学术研究乃至社会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和目的是什么?是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还是探索社会世界(相对于自然界)的规律和真理?我认为,政治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使命和追求的目标应该是探索社会世界或政治现象的发生规律和真理,即探求和解释政治现象发生的原因,通过跨国界的比较研究,总结出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理论或一般规律(*general patterns or laws*)。这并不排除对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特别是要通过理论来指导实践问题的解决。这就是说,通过对地方性问题的研究所得出的地方性知识上升到普遍性的理论,才能更有效地参与国际对话,才能实现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目的。比如,现代经济发展和中国市场改革带来了一个产权问题,我们是从古代宗法关系或道德规范角度来解析和批判现代的产权问题呢,还是从现代经济学和法学的理论角度来深入分析和跨国比较“产权”问题的产生和发展、司法和宪法意义,从而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并对产权理论做出贡献呢?我认为后一种,如此才有可能与世界进行实质性的对话,并对世界社会科学做出贡献。

第三,理论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理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政治研究并不是简单地概括经验观察、事实、数据,而是发现数据或对经验世界有意义的规律,并有效解释所观察的个人、群体、社区、地方、国家等各个层次发生的政治现象、要素、行为或行动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且,理论是理解、解释和预测政治现